



焦润坤

从国际灾童教养院

与习近平一同为“独立自由勋章”雕塑揭幕

1 贴着红膏药的飞机

江苏常州青果巷，青砖白墙，青果飘香。一条数百米的长街，沿水而筑的老宅子，是焦润坤童年的底色。

在老常州人眼里，撑船、打铁、卖豆腐，是世上最苦的行业。焦润坤家就开了一片豆腐店，几乎全靠母亲一个人支撑。

他的父亲不幸患了肺病，穷人生肺病，是雪上加霜。

母亲姓钟，没有名字，嫁给父亲后，大家都唤她“焦钟氏”。在大家的印象里，焦钟氏是一个穿着粗布短衣卖豆腐的妇人。

可是在焦润坤的心中，母亲是这世上最温情最坚强的女人。

小时候，焦润坤喜欢在清浅的河里嬉戏，母亲在对岸一喊，他就“扑通”一声扎进水里，游啊游啊，游到母亲身边。母亲，正慈爱地望着他。

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。焦润坤上了两年学就辍学了，家里还有年幼的弟弟妹妹，负担不起。

10岁，他便开始头顶竹匾，帮母亲卖豆腐。

13岁那年，焦润坤像往常一样拎着竹篮，在火车站一带沿街叫卖。“卖豆腐咧，卖豆腐

咧”，小小的他并不知道，这一天，是他童年的终结。

那是1938年。突然，空袭警报响了，老百姓都没在意，以为只是演习。

直到有人大喊“贴着红膏药的飞机来了”，不一会儿，敌机就出现在城市上空，炸弹如雨点般落下，炸开一道道血光。

焦润坤吓得赶紧埋头躲在墙角，大约过了半个小时，等飞机远去，他缩着的头跑了出来。那惨不忍睹的景象，令他终身难忘。

好几条街巷，死伤遍地，路上到处是炸飞

的腿。

“救救我，救救我”，一声声惨叫和哀嚎声灌耳而来。

焦润坤吓得马上逃回青果巷。父母匆匆收拾了行囊，带着焦润坤和他的弟弟妹妹，辗转南下。

不料，在上海郊外，焦润坤与父母在慌乱中失散了。

从此，焦润坤成了孤儿，在上海涌动的难民潮中，奔东赶西，孤苦伶仃。

直到被竺梅先夫妇收养，他与600多个灾童一起，在奉化泰清山下的国际灾童教养院里生活学习。

2 教养院里的日子

到教养院后，见到竺梅先院长的机会不多，但只要他出现，就会用浓重的奉化口音勉励大家：“不要忘记国仇家恨，应发奋自强，努力学习，强健身体，将来为国家奉献。”

1940年秋天，日本人在宁波开明街空投鼠疫病毒的杂物。几天后，开明街爆发鼠疫，许多人丧命。

教养院100多个孩子忽然生了疥疮，焦润坤也是其中一个。

瘦弱的他，全身长满脓疮，大的有蚕豆那么大，小的也有黄豆般大。他拿剪刀一个个剪破，用淡盐水一擦，创口生疼，有时候疼得都快昏过去了。但是没办法，这是消毒。

如果遇上大晴天，就要排队到太阳底下暴晒。他撩起上衣，瘦得皮包骨头。

晚上疼得睡不着，牙缝里发出“啞啞”的呻吟声。早上起来更折磨人，脓血与被子粘连，把棉被一层一层撕开，疼得他哇哇大哭。

好不容易疥疮好了，焦润坤又“打摆子”了。

打摆子，学名“疟疾”，又叫“冷热病”。发作的时候，即使身上的棉被盖得跟小坟堆一样，还是冷得直打哆嗦。

不一会儿，又热得像火烤，浑身高烧，嗷嗷着胡话。副院长徐锦华来看他，心疼得不行。

“我热得真想跳进溪坑里凉快凉快。”焦润坤对徐锦华说。

徐锦华知道他说胡话，还是极力劝阻：“孩子啊，千万不要去溪坑啊。”

从宿舍出来，徐锦华想尽办法派人到宁波买来奎宁粉，这药粉苦得很，连哄带骗，用嫩



焦润坤在国际灾童教养院留影

菜叶把药粉裹好，塞进他的口中，才治好了病。

徐锦华温柔慈祥的样子，让焦润坤想到自己的母亲。

他一直坚信，他与母亲只是失散了，总有一天，会找到她。

1942年，竺梅先去世了，教养院像个大家庭一下子失去了顶梁柱，

也失去了经济来源。

安排院童一个光明的去处，迫在眉睫。

18岁的焦润坤与一大批同学，参加顾小汀的淞沪一支队，这是地方武装，与尚在隐蔽的三五支队关系很好。

徐锦华站在琅溪桥上挥手作别的情景，这么多年了，他还是记在心里。

3 新四军抗日战士

离开教养院，冷热病还没断根，仍然伴随着焦润坤，时时发作。

1943年春天，顾小汀的部队被国民党军队吞并，正好那个时候，焦润坤的冷热病又犯了，暂住在村民家养病，幸免此劫。

那年3月初，他被三五支队大队长张季伦带领的部队收编，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。

不久，鬼子大扫荡，眼见着日伪军进村，乡

亲们纷纷离家出走，焦润坤怕连累到照顾他的村民，也赶紧跑出村。

面前是一片秧田，他急忙卷起裤管，混在插秧的村民中，不时抬头查看情势。

远远望去，一群日伪军，大约有70人，踩着田埂自东向西走去。

等他们走远了，他慢慢地走出秧田，只觉得两腿剧痒难忍。低头一看，黑乎乎的十几只蚂蝗正贪婪地吮吸着腿上的

血。焦润坤赶紧用手去拉，结果越拉打得越紧。

一位村民见了，叫焦润坤别拉，要用手使劲拍。他便使劲拍打蚂蝗，不一会儿，这些吸血的东西卷起身子落到地上。

这个时候，他的两条腿已经被咬得鲜血淋漓，他也顾不了那么多，急匆匆地去找寻部队。

一连走了好几个村子都没找到，眼看着日落西山，他心里急得不行。一路问村民，终于经一位村干

部的指点，找到了部队。

焦润坤把一路上的情况告诉领导，领导很是赞赏，让他担任自卫大队的文化教员。

他在连队积极教唱抗日歌曲，鼓舞斗志，这些歌曲都是他在教养院里学的。每到一处，歌声不断，部队的文化生活也丰富了起来。

从此，他真正成为了一名新四军的抗日战士，投入到抗日救国的战火硝烟中。

《600个孤儿的母亲》后续

温煦的初夏午后，在北京宣武区的一幢灰墙斑驳的楼房里，记者见到了91岁的焦润坤。

他腰杆挺直，语调高亢，思路清晰，一副标准的军人模样。

回忆自己的一生，他用一句话概括，简短有力：“我是日军暴行的见证者、受难者、抗争者。”

去年，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仪式上，年过九旬的他与习近平总书记一同为“独立自由勋章”揭幕。

一夜之间，他成了名人。全国媒体的采访不断，邀约不断，他的身体几乎透支了。

接受采访那天，他还有些发烧，可是讲起在奉化的那段日子，他的眼里闪出炯炯的光来。

他是从国际灾童教养院里走出来的抗日战士，曾是宁波帮竺梅先与徐锦华收养的600个孩子之一。

“宁波，是我的第二故乡。”

午后的阳光疏淡地拂过窗棂，照进他脸上的褶皱沟壑，那是承受过万万千苦难生活的刀痕与凿印。

特派记者 陈也喆 北京报道